

日寇在海启地区曾使用毒气弹

□李元冲



1942—1943年东南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图

史海回眸

尽管日本政府极力否认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中国实施过化学战的事实,但从目前揭露的许多事实看,侵华日军分别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的许多战场使用毒气,那么当年侵华日军有没有在海启地区使用毒气呢?前不久笔者为宣讲党史教育课而寻找东南警卫团的战斗资料时,发现了秦镜大校的一篇《参加东南警卫团前后》的回忆文章,确认侵华日军曾向东南警卫团使用过毒气!

秦镜,出生于1919年12月,江苏省启东县大兴镇人,1938年7月参加通海抗日游击队,受指挥部内共产党员的影响,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秦镜从游击队转入党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五团,历任排长、特务连连长,1941年海启警卫团成立时,秦镜所在连队被编入海启警卫团,成为海启警卫团的主力之一,1942年海启警卫团更名为东南警卫团,秦镜任东南警卫团二营营长。以后历任华东野战军四纵队教导团团长、23军副参谋长、69师师长等职,解放后任济南军区67军参谋长、副军长、济南陆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

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2013年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2002年秦镜来启东参观访问时,应邀留下了一篇《参加东南警卫团前后》的书稿。其中写下了一段关于日军当年使用毒气弹的回忆。

日军在海启地区使用毒气弹就发生在秦镜任东南警卫团二营营长期间。1942年日军在海启地区的大扫荡失败后,开始组织大“清剿”,他们从南通、泰州等苏北地区增调来2000多兵力,集中于茅镇、四甲、掘港、吕四、汇龙等主要集镇,同时培训了进行“清剿”的伪军政人员,封锁了海启的江面与海面,企图集中力量一举消灭海启地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了减轻敌人对海启地区的压力,苏中军区及一师师部也向各地发出了指示,要求各地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向日伪发动进攻,以减轻海启地区的压力。这时东南行署(海启地区因地处苏中南部而得名)和东南警卫团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正严阵以待。

1942年9月16日,敌人探听到我新四军一师指挥部驻扎在海门东区的海复镇(今启东市海复镇),粟裕师长就在海复镇(当年师部在今启东东南中学校园内)。于是驻在吕四、汇龙、海复等地的伪军分三路包围海复

(实际上粟裕师长及一师指挥部已在二天前秘密转移)。时任东南警卫团团长的梅嘉生决定将计就计,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梅嘉生在得到敌人来进攻海复镇的情报后及时从中央镇、聚阳镇等地根据地抽调了三个营,来对付敌人的三路进攻。三个营预先设伏在青纱帐里,一营由西向东进攻,二营即由秦镜营长带领打击自东南方向来犯之敌,三营作第二梯队。伪军首先进入了伏击圈,一营和二营及时发起进攻,敌人猝不及防,死伤大半,伪军团长也在战斗中丧命,伪军少了指挥官,就像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大部分当了俘虏。这时三营立即扑向日军,敌人尽管装备精良,但在短距离的战斗中,大炮一时又派不上用处,因此被打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向二营四连阵地(即海复镇东北方向)突袭,又遭到四连的顽强阻击。这时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摔出了毒气弹,一时间黄色毒气嗤嗤冒烟,顷刻间烟雾弥漫,令人窒息,四连战士个个涕泪交流,无法睁眼。有些老战士曾听到过一些防化知识,立即提醒大家赶快用湿毛巾捂嘴,但近处又没有水,这时又有战士提醒用小便撒湿毛巾,但由于突如其来神经紧张,哪来小便?这时教导员周蜜好容易解出了小便,但也湿不掉几条毛巾,解决不掉大问

题……就这样日本鬼子乘着烟雾、乘着我方注意力无法集中之际逃走了。这次战斗牺牲了不少战士,五连指导员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更有许多指战员受到了毒气的伤害。秦镜在文章中最后回忆说:由于他们的阵地在海复镇东南,毒气是顺着风从东北方向吹向西南方向的,总算逃过了一劫。

这场战斗,尽管敌人使用了化学武器,大部分鬼子逃走了,但还是被我们抓到了大量俘虏(伪军为主)。同时由于敌人使用了这种反人道反国际法的化学武器,更加激起了海启地区军民对日本鬼子的憎恨,海启军民以满腔的怒火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清剿”反“封锁”的斗争中去,使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据苏中四分区出版的东南报社编著的《血腥的旗帜》统计:1943年海启地区军民全年开展大小战斗1098次,毙伤鬼子316名,毙伤伪军455名,俘鬼子伪军348人。其中东南警卫团进行大小战斗73次,毙伤鬼子118名(其中毙57名),毙伤伪军124名(其中毙85名),俘伪军164名;据行署9个区队统计共进行大小战斗391次,毙伤鬼子171名(其中毙87名),毙伤伪军253名,俘伪军101名;行署民兵开展大小战斗634次,毙伤鬼子27名(其中毙17名),毙伤伪军78名(其中毙43名),俘伪军81名,另外还活捉了2名鬼子。



高明庄土改运动:分者清廉,得者欢喜

□彭伟 陈红

高明庄是苏中解放区著名的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叶飞指挥的高明庄战斗在这里打响,歼灭数百日伪军;解放战争时期,苏中七战七捷中,如黄战役大捷,后方临时医院就设在高明庄。在高明庄,还举行过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今日回顾这场运动,对于加强党纪教育,宣传廉政思想,仍有意义。

1946年4至5月间,国民党反动部队已经蠢蠢欲动,活跃于苏中地区。内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政治环境,严重阻碍苏中解放区“减租减息”运动。在高明庄地区,“减租减息”运动起初按照“谁算谁得,积极多得”的政策方针进行,其中难免滋生腐败,带来分配不公。大量没有租田或者租田很少的贫雇农因为“无账”可算,得利很少甚至无利可得。他们这群人也要得到实实在在的土地,因此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抵制。这种情况在其他解放区也很普遍。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逐渐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实现解放区耕者有其田。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支持贫农获得土地的要求。

高明庄开展“五四”土改,恰逢苏中七战打响。正是在那种烽火岁月,清廉奉公的高明庄干部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援家乡、参加前方战士,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搞好土改工作。整个土改运动前后经历约两个月(6月底至8月中旬),分为三个步骤,政策透明公正。具体政策包括:1.凡是农村居民(纯商业户除外),都被分有土地;2.以村为单位,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中农超过平均数不多的一般不动;3.村与村之间土地相差较大的,可以进行调整;4.地主成分的烈军属及开明绅士,留地一般多于平均数;5.佃农租进地加自耕地,超过平均数的,应抽出超过部分;6.长工、雇农一般先从地主、富农的自耕地中分;7.宅地、非耕地,未列入耕地方案中分配……

政策固然好,还须干部清廉,认真执行。从高明土改的几个步骤来看,不乏佐证。第一步是6月底至7月上旬,建立组织领导,全面宣传土改运动的政策。为防止土改运动中产生腐败或不公现象,高明庄每村组建分田委员会。每个分田委员会共计15人,以贫雇农、党员干部为主,互相谈论、监督,推进土改活动。分田委员会还邀请大量群众监督分田委员会调查统计的土地情况(包括出租地、自耕地、租进地)及确定的分田人数。对于分田委员会来说,形成内外监督机制,确保其清廉的工作作风及土改运动的公平性。

第二步是7月中旬,分田委员会积极发动各村群众吐苦水、挖苦根,组织起三百余人的队伍,将富农手中的土地夺走。

7月下旬至8月初,高明庄“五四”土改运动进入实质性的第三步。分田委员会将夺来的土地及中农超过平均数可以抽出的土地等,在一个行政村的范围内,按总田亩数和总农业人口数,计算出平均人口应得的土地亩数,随后内部制定到户分田方案,包括谁家出多少田,田名及坐落地点,谁得多少田及地名界址等细节,都要一一确定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体的方案公平吗?其中是不是有腐败,比如分田委员会成员会不会趁机照顾自家或亲朋好友呢?为此,高明庄的清廉干部小心翼翼,出台三项政策:1.所有分配方案及结果,不是分田委员会一家指定,而是要送交村民大会进行数回民主评议,通过才被认定为合法结果;2.分田委员会必须通过大会,向全村人民公布相关结果,即这些结果不仅要得到参会人员的同意,而且还要得到全村人民的支持,即依赖群众的监督,再次确保分配结果公平;3.分田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脚踏实地,要求分田委员会相关人员必须带领群众,前往具体田地,做好土地交割工作。秋收前,整个“五四”土改运动,分田到户,顺利结束。

分者清廉,得者欢喜。由于党员干部清廉,群众监督有效,高明庄“五四”土改运动十分公正,赢得群众老乡的支持。这对于正在进行的苏中七战也有帮助。为了保住“五四”土改运动的革命成果,高明庄人民积极支持粟裕率领的部队,打击敌人,为苏中七战七捷立下功劳。

南通影响外地地名

□黄浪

地名掌故

名,“狼山湾”即是一例。除了“狼山湾”这样的历史地名,一些现存地名中也保留着“南通元素”。“狼山湾”附近的常通港便是其中的典型。“常通港”顾名思义是以常熟、南通两个地名命名的河流。常通港开凿于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划定河港以北为通州直隶州所有,共计约10平方公里土地,以南为常熟所有,这一划界一直持续到民国末,达半个多世纪。今天的常通港南北都属张家港,但常通港地名未变,南通的历史痕迹通过地名得以保存。

甚至长江上不属于南通的沙洲也以南通地名命名,张家港境内的通州沙便是如此。通州沙虽然地理位置更靠近江南,却使用了“通州”之名,足见南通的影响力。

苏南有受南通影响的地名,苏北也同样如此,最典型的历史地名为东台的通泰镇。“通泰镇”得名于1916年,其中“通”的含义即是南通,“泰”为泰州。在此前后,从南通、海门等地迁徙至此数千人,人们在这里开拓土地,进行建设,以至于“南通”的名称也在“通泰镇”中得到体现。1939年通泰镇被日本侵略军焚毁,人们重建新街,起名“新街”。今天虽然“通泰镇”已成为历史,但南通的名称仍存于东台新街镇的“通泰路”“通泰桥”等地名中。

除了“通泰镇”,还有“通榆镇”。通榆镇位于盐城市滨海县南部,其前身通榆乡设置于1957年,以通榆河命名乡镇名,而通榆河的名称来源于南通和赣榆的合称。

苏北现存地名受南通影响最大的则

是“大丰”。大丰原名“台北”,后因与台湾省会台北重名,于是在1951年改名“大丰”,而“大丰”的来源则为张謇在大丰草堰境内创办的“淮南草堰场大丰草堰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大丰”二字,“大丰”和早期南通民族资本发展息息相关。

外地地名中最能彰显“南通元素”的自然是与南通相关的路名,省内的南京、扬州、泰州都有一条“南通路”,其中南京鼓楼区在1935年即有了“南通路”。其他拥有“南通路”的城市还有山东烟台、河南焦作、广东湛江等等。

当然,南通的地名也受到外地地名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崇川区”的“崇”字即来源于“崇明”之“崇”,海门区老集镇崇海镇的称呼也与崇明相关。而这体现出了南通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紧密,真正做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民国时期如皋的纪念性建筑

□程太和

老建筑

民国时期如皋有四大纪念性建筑,分别是:中山钟楼、中山亭、奉安桥、民三烈士纪念塔。

[中山钟楼]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奉安,如皋各界举行大会,宣布由县建设、教育两局投资营建中山钟楼,以示纪念。地址选定于县政府前古谯楼遗址,历时两年于1931年建成。楼为砖木结构,上下5层,从阳台栏杆至地

面高16.22米,东西长5.36米,南北宽5.32米,楼底门高3.5米。第4层楼安置

有巨型铜钟,中央朝南钟面直径1.525米,罗马数字标时。时任县长钱佐伊在《中山楼记》中引用孙中山先生遗训:“人民平等,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又写道:“过斯楼闻钟者,当如亲聆总理之遗训,孳孳日有趋焉!庶不负创建之用心欤!”1956年如皋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12月26日,如皋县人民政府改称如皋县人民委员会)重铸大铜钟,“文革”中遭毁坏,1981年修复。1995年如皋旧城改造,打通北门,延伸海阳北路时,中山钟楼拆除。

[中山亭]位于如皋市人民公园内。

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而建。初为砖木结构。1949年因其形状改称“六角亭”。1969年,将木柱改为水泥柱。1978年大修,全部改为水泥结构。1981年10月重修,复名“中山亭”。[奉安桥]位于如皋北门外花市街东首。建于1929年7月,为砖石结构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定名“奉安桥”。“奉安桥”石刻文为:“出县治北门,东行百余步,有砖涵一。岁丙寅,涵倾圮,交通阻隔,行者诚以为不便。绍周(即马绍周,当时的如皋县行政局局长)等联络同志,纠工集资,改建石桥,与中山桥东西相望。桥长二丈三尺,高八尺,

宽五尺,桥门五尺八寸。同时修竣,平平坦坦,民莫不利。夫方便行旅,总理遗志也。而斯桥兴工之时,适当总理奉安之日,爰定名曰奉安”。1953年如皋县人民政府出资维修一次。1983年又将此桥重建,仍称“奉安桥”。

[民三烈士纪念塔]位于如皋市人民公园内,建于1934年7月,塔身高6米,为正方形,下阔上窄,顶端尖耸,塔基嵌有碑文,记载1914年如皋程强、冯余庭、杨桂馨组织乡民参加讨伐袁世凯斗争之事迹。1934年,在三烈士牺牲2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如皋县政府奉江苏省民政厅令择定如皋公园内建“民三烈士纪念塔”褒奖。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